

Eco-capitalist
Political Theory and
Its Critique

当代西方 生态资本主义理论

郇庆治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10BKS049

Eco-capitalist
Political Theory and
Its Critique

当代西方 生态资本主义理论

郇庆治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西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郇庆治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 - 7 - 301 - 25799 - 9

I. ①当… II. ①郇… III. ①生态环境—政治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D0 - 05
②X1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2723 号



书 名 当代西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
著作责任者 郇庆治 主编
责任编辑 闵艳芸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5799 - 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minyanyun@163.com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印 刷 者 北京溢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28 印张 444 千字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目 录

导言 21 世纪以来的西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 邰庆治 / 001

第一部分 生态现代化

- 第 1 章 走向可持续发展:不同于 GDP 方法的进步量度
[德]菲利浦·舍佩尔曼 著 邰庆治 译 / 051
- 第 2 章 生态现代化理论:德国学派及其国际意蕴
邰庆治 [德]马丁·耶内克 / 079
- 第 3 章 清洁能源市场的动态管治:促动气候政策中的技术进步
[德]马丁·耶内克 著 邰庆治 译 / 090
- 第 4 章 清洁能源和环保技术领导权的竞争
[美]米兰达·施罗伊尔斯 著 王聪聪 译 / 108
- 第 5 章 生态现代化视角下的欧盟气候治理战略 李慧明 / 125

第二部分 环境公民(权)与绿色国家

- 第 6 章 环境公民权与环境友好行为:批判性评述
[英]安德鲁·多布森 著 邰庆治 译 / 147
- 第 7 章 正义、民主和环境:一种自由主义的环境公民权概念
[英]德里克·贝尔 著 杨晓燕 译 / 182

第8章 全球化、世界主义和生态公民权

[西]安吉尔·瓦伦西亚·塞兹 著 郭志俊 译 / 202

第9章 生态民主的挑战性意蕴

[澳]罗宾·艾克斯利 著 邰庆治 译 / 218

第10章 作为欧洲党的欧洲绿党:以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为例 邰庆治 / 241

第三部分 环境全球(公共)管治

第11章 全球环境管治改革:争论与进展

[巴]阿迪尔·纳贾姆 [美]米哈拉·帕瑟 [印]纳达·泰亚伯 著

邰庆治 译 / 257

第12章 气候资本主义:低碳经济的政治学

[英]彼得·纽厄尔 [加]马修·帕特森 著 王聪聪 译 / 273

第13章 环境税改革与绿色增长:欧洲视角

[英]保罗·埃金斯 [德]斯蒂芬·斯宾克 著 邰庆治 译 / 292

第14章 全球地方治理视角下的跨国城市气候网络

李昕蕾 / 310

第15章 公私合作关系: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第三条道路”

邰莉 / 342

结论 全球化、环境与生态资本主义

[美]罗尼·利普舒茨 [美]菲丽西亚·佩克 著 邰庆治 译 / 383

主要参考文献 / 404

参著者简介 / 441

导言 21 世纪以来的西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

郇庆治

内容提要：“生态资本主义”的初始性内涵是把市场原则扩展应用于各种形式的物质价值尤其是自然资源，进而，它希望、相信和设想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克服或至少实质性缓和人类目前面临的生态环境挑战。因而，生态资本主义既是一种较为实用主义的或注重实效的绿色政治社会理论，也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或“浅绿的”绿色政治社会理论。对生态现代化、绿色国家、环境公民权和环境全球管治等主要理论流派进入 21 世纪以来最新进展的回顾性评述表明，“生态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确带来了当代欧美国家某些政策创制与制度革新意义上的“绿化”，但同时也突显出如下三个方面难以克服的内源性矛盾：渐进改善与结构性变革的矛盾，个体环境意识、责任和行动与国家培育、规约之间的矛盾，本土中心与全球视野需要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生态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绿色国家、环境公民权、环境全球管治

在阐述自 21 世纪以来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的进展时^①,笔者引入了一种“三分”或“三位一体”的方法,即把 20 世纪 60、70 年代以来首先在欧美国家兴起、如今已扩展到世界范围的广义的“绿色运动”大致分为 3 个组成部分:以生态中心主义哲学价值观为核心的“深绿”运动、以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替代为核心的“红绿”运动和以经济技术手段革新为核心的“浅绿”运动。无论是从研究方法论的完整性还是从绿色政治变革的现实可能性的视角来看,对“浅绿”运动的更细致分析都是全面认识当今西方环境政治理论与实践并对较为激进的“深绿”或“红绿”运动做出更科学判断的必需前提。基于此,笔者将对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西方生态资本主义(“浅绿”)政治理论的最新进展做一初步梳理与评述,从而为全书的讨论确定一个共同的理论与分析框架。

一、生态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向度

依据维基百科的界定^②,“生态资本主义”(eco-capitalism)是绿色运动与绿党政治的诸多战略之一。其基本理念是,对于人类有着可以量度的生态产出或实在好处的自我更新性生态系统应当被视为一种“自然资本”,而由人为制造的其他形式资本(比如基础设施资本和金融资本)只是通过创造、培训和照看来扩展与优化这种“自然资本”才能产生财富。依据这种观点,生态系统服务是一种服务型经济的基础,而干扰自然的生态服务不是在创造而是在破坏价值,因而不应获得国家的鼓励或补贴。但与此同时,它坚持认为,人类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组织经济的最有效形式。通过依此来承认地球或自然的价值,与其他类型的绿色政治学或经济学不同,它倡导和追求所有的生态友好的经营模式和经济政策,比如可持续的农/渔业政策,并寻求基于一种生态资本主义的生活/地球价值分析的解决环境难题或保护“环境公共物品”的创造性政策工具。不仅如此,由于所有形式的物品或需求都被简化成为某一数字,这就使得一种统一性的全球主义成为可能。比如,《京都议定书》可以说就是依据

① 郇庆治:《21 世纪以来的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 年第 3 期,第 127—139 页。

② Wikipedia, 'Eco-capitalism', <http://en.wikipedia.org/wiki/Eco-capitalism>, accessed on 10 December 2011

发达国家支付预防气候变化导致人类死亡的能力将发展中国家的个体生命价值确定为发达国家的1/15。因此,“生态资本主义”通常被视为一种建设性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现实政治”战略:既存的经济政治权力结构及其支持系统和正在形成的关于生态系统价值共识之间的妥协,并与主张激进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结构变革的“红绿”和“深绿”政治相对立。

与上述较为狭义的描述相比,笔者认为,“生态资本主义”可以更宽泛地概括为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机制共同组成的资本主义制度架构下以经济技术革新为主要手段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渐进性解决思路与实践。毋庸置疑,作为当代西方国家中的主流环境政治流派,“生态资本主义”在促成绿色的或环境友好的政策和社会变革方面发挥着突出的作用,如果不是最为重要的作用的话。不仅如此,甚至可以认为,正是这种“生态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承担着创造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的“绿色经济增长”和“绿色政治合法性”的新机遇的使命。

“生态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方面是明确肯定和赋予自然生态环境中的某些要素及其组合以“资本”的(尤其是货币的)价值,并力图在商品化的经济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中(主要通过成本核算和技术革新)来体现与实现这些“生态资本”的价值。其生态环境保护效能的逻辑是:一方面,如果在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中正确核算了(当然是按照实际的或虚拟的市场价格)生态环境要素的资本价值,那么,传统生产所导致的环境外部性将会实现内部化——既不存在免费的自然生态成本输入,也不允许免费的环境污染物输出,另一方面,如果生产经营者都做到考虑自然生态要素的投入成本和环境污染物的排出成本,那么,市场竞争的机制将会导致生产效率尤其是资源利用效率的不断提高,因而最终将是一种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效果。

需要强调的是,就像“生态资本主义”从不质疑和挑战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前提(即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政治)一样,它也拒绝或不接受环境保护动机或生态道德意义上的追问与批评。换句话说,它所看重的是传统经济生产与消费活动所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现实的切实改善,而不是促成或鼓励了那些集体(公司)和个体(消费者)的相关性行动的背后动机。甚至,它可以大大方方地承认,人们之所以从事那些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集体行动(企业改善管理与实施技术革新)和个体行动(改变传统生活方式与习惯),恰恰最可能

是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目的或需求(比如更多的企业赢利和消费节省)。

对于前者来说,在题为《自然资本主义:创造新一场工业革命》(1999)^①的著作中,保罗·霍肯(Paul Hawken)、艾默里·洛文斯(Amory Lovins)和亨特·洛文斯明确阐发了“生态资本主义”是一种新资本主义的观点。他们明确承认,全球经济是依赖于自然资源以及自然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自然资本主义”是对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一种批评和超越,因为传统的资本主义“未能将其会计原则贯彻到底,即扣除资本之后才能称之为收入。它未能赋予其大量使用的资本存量以价值:自然资源及其生态系统,以及作为人力资本基础的社会与文化系统”。依此,“自然资本主义”承认了人为资本的生产与利用和自然资本的维持与供应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并强调,对地球资源依赖性的认可是工商业以及所支撑的人民持续生存下去的前提。

霍肯和洛文斯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是,一种充分考虑了各种形式资本的价值经济会是什么样的呢?一种不是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和会计准则而是按照自然的生物现实组织起来的经济会是什么样的呢?如果目前公认的会计准则将自然与人力资本接受为有限并且不可或缺的价值元素而不再是取之不尽的免费供应品会怎么样呢?在尚缺乏一种行之有效的新会计准则的状况下如果某些公司率先行动又会怎么样呢?在他们看来,这些选择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这样一种经济会给全社会带来崭新的机遇,其重要性不亚于一场新的工业革命。而这场新工业革命的发生依赖于如下4个核心性战略:通过更高效的制造过程而实现的能源保持、自然系统中发现的材料的重新利用、从数量向质量的价值转变、投资自然资本或重建与维持自然资源。因而,如果说传统的资本主义优先强调货币和商品的资本价值,那么,自然资本主义同时也承认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价值。相应地,环境污染和社会非正义可以理解为未能适当核算不同形式资本的价值的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失败。

“生态资本主义”的基础性理论假定可以概括为如下6个:(1)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因素是自然资本的可获得性及其正常功能发挥,尤其是那些不可替代并且目前没有任何市场价值的生命支持服务。(2)错误或不良设计的

^① Paul Hawken, Amory Lovins and L. Hunter Lovins, *Natural Capitalism: Creating the Next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9);也可参见霍根等:《自然资本论:关于下一次工业革命》,王乃立、诸大建、龚义台(译),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0年版。

商业系统、人口增长和浪费型消费是自然资本流失的主要原因,它们必须在追求一种可持续经济的过程中加以改变。(3) 民主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生产与分配体制更有利于未来经济进步的实现,其中,各种形式的资本得到充分估价,包括人力资本、制造业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4) 人力、货币和环境最理想利用的关键之一是资源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5) 人类福利的改善最容易通过所提供服务的质量和循环来实现,而不是仅仅依靠提高货币本身的流动性。(6) 经济 and 环境的可持续性依赖于缩小收入与物质富裕的全球性不平等。^①

也就是说,“自然资本主义”所明确倡导的是一种绿色的工业主义或新时代的资本主义——更高效、更具有赢利性,同时又能保护环境和创造就业。比如,霍肯和洛文斯对未来描绘说,新世纪的轿车将能够做到每加仑汽油行使 200 英里而不会影响其安全与动力,制造商将会想方设法地重新回收其产品,世界生活水平将会在不再破坏自然资源的条件下大幅度提高。不仅如此,他们充满自信地问答:“这是一种乌托邦的想象吗?事实上,这些变化将会由于已然发生着的经济与技术趋势而在随后数十年中成为现实。”

对于“生态资本主义”的去道德性来说,最能展现这方面特征的著作也许是亨特·洛文斯(L. Hunter Lovins)和博伊德·科亨(Boyd Cohen)合著的《气候资本主义:气候变化时代的资本主义》(2011)。^② 在那看似琐碎而具体的实例研究(涵盖了不同行业的跨国公司、小企业、NGO 和市镇当局是提高能效与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创新尝试)的背后是一种明确的功利性“生态资本主义”信息,“你是否相信气候变化并不重要。但你必须明白:重建我们的经济、城市和就业市场,以及确保国家安全的最佳途径,是按照你对于气候变化最恐惧景象下可能采取行动的方式行事。无论你是一家之长或一个跨国公司的 CEO,拥戴效率、革新、可再生能源、碳市场和新技术,是你可以做出的最明智决定。这也将是一个最具有赢利性的决定。与此同时,你将有助于拯救这个星球”。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在一个受衰退折磨和碳排放制约的世界中,资本主义的未来取决于这些创新性企业家所带来的市场与技术革新,当然,这些企业还创造

^① Wikipedia, 'Natural Capitalism: Creating the Next Industrial Revolution', http://en.wikipedia.org/wiki/Natural_Capitalism:_Creating_the_Next_Industrial_Revolution, accessed on 12 December 2011

^② L. Hunter Lovins and Boyd Cohen, *Climate Capitalism: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Climate Change*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11).

了劳动就业并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

而在推荐该著作时,著名的北美太阳能公司 SunEdison 的创建人吉加·沙(Jigar Shah)公开宣称:“这是创业者、投资人、工业专家和公司老板的必读之书,因为它将告诉你如何利用我们时代最大的赚钱机会:应对气候变化”,“碳公开项目”的革新部主任汤姆·卡纳克(Tom Carnac)则强调,“对于那些致力于落实真正的气候解决方案并想依此赚钱的人来说,《气候资本主义》是再好不过的读物”,而泰华施公司(Diversey)的总裁柯蒂斯·约翰逊(Curtis Johnson)则承认,“泰华施公司正是运用了该书所描述的原则提高了我们的利润率。我们投入气候保护的每一个美元都获得了两倍的回报”。^①

就此而言,戴维·约翰斯顿(David Johnston)——《自下而上变绿:可持续的、健康的和高能效的家庭装修》^②的作者之一、功利性“生态资本主义”理念的热情追随者——对《气候资本主义》一书的极度赞誉也就在“情理”之中:“总会有那么一个事件、一次演讲或一本著作改变了这个世界,而《气候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本书。就像《自然资本主义》激发了无数工商业者重新思考其基本理念一样,《气候资本主义》描绘了气候变化带来的机会而不是危机。它把工商业置于投资于未来的领导者地位,可以在抑制气候变化的同时提高赢利性。洛文斯和科亨颠覆了如下经济论点,即能源节约和可再生能源会影响就业。”

然而,“生态资本主义”至少会面临着如下两个不可避免的难题。一是环境友好型或绿色企业决策时的经济成本收益比较,二是自然生态的资本化程度及其内在限制。就前者来说,企业在决定是否采取一种环境友好的政策时,其直接的判定尺度是这种决策的经济成本收益核算:如果经济收益大于投入成本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是相反结果的话立场也会很明确。问题是,虽然不能排除如下可能性,即某些着眼于全局和长远利益的企业会先行冒险采取亲生态投资,但对于绝大多数企业来说,现实赢利和规避风险永远是第一位的选择,即便是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也不例外——这正是“红绿”和“深绿”理论所批评的资本的逐利本性和市场的短视本性。就后者来说,自然生态的资本化在现实生活

^① Amazon, <http://www.amazon.com/Climate-Capitalism-Age-Change/dp/0809034735>, accessed on 10 December 2011

^② David Johnston and Scott Gibson, *Green from the Ground Up: Sustainable, Healthy and Energy-Efficient Home Construction* (Newton, CT: Taunton, 2008).

中不可能是一个可以穷尽的过程——赋予所有的物质价值以确定的、更不必说适当的价格,这意味着,人们只能有选择地进行资本化,而这种选择性往往是由资本或市场主宰的而不是基于自然生态保持的必要性和优先性。

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实例是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中提出的虚拟的“碳市场”以及“低碳经济”。它的逻辑起点是一个国家或国际社会设定某一数值的区域空间内大气可以允许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浓度含量,然后分配给其中的构成性成员(主要是工商企业单位和行政主体),然后,这些构成性成员将围绕着如何使用自己的“碳份额”展开市场竞争——可以节省(通过技术革新)、交易(通过购买他人的闲置份额完成自己的减排任务)和冲抵(通过生态投资于植树造林)。这一切初看起来似乎简捷明了,简单易行。但在国内层面上,且不说我们如何知道大气层中真正能够承载的温室气体浓度含量,即便仅从上述三种行动选项的选择来说,“理性的”工商业者几乎可以肯定会做出一种“理性的”决策——资金投入成本较低的、技术革新成本较低的或行政管理成本较低的决策。事实也是如此。在国际舞台上,人类现代工业化与城市化生产生活方式的复杂转型被简化为可以测量、交易和冲抵的“碳排放”,但却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碳密度”的巨大差异而变得难以切实落实,《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1998—2012)的不理想结果和达成第二承诺期(2012—2020)目标上的艰难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①唇枪舌剑的环境国际政治博弈背后其实是一个“气候资本主义”无法回避的问题,即自然生态(大气)资本化的程度及其边界。

在实践层面上,可以想见,“生态资本主义”有着非常广泛的政治信奉与支持者,尽管它们可能未必都愿意公开接受这样一个称谓。具体地说,除了公开鼓动与践行“生态资本主义”或“工商业可持续发展”的少数绿色工商企业,比如前文提及的《气候资本主义》一书倡导的绿色经营战略的追随者,在政党政治图谱中包括从绿党主流、社会民主党中右翼到保守党或自由党的绿色一翼的广泛政治力量,都在某种程度上支持某种形式的“绿色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

创建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绿党(特别是欧洲绿党)虽然在政

① 网易新闻:“德班世界气候大会”,<http://news.163.com/special/cop17/>,2011年12月10日。

治意识形态和基本政治纲领上仍然不乏激进绿色变革意义上的立场和言辞,但在日常性议会政治与政策主张上已经日渐接近于一种“正常性”政党,而不再是一种“反制度”或“替代性”政党。至少,当初普遍存在的党内“基要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理论斗争和社会运动型的基层取向组织结构已经不复存在。相应地,对多元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制度的信奉与遵从已成为当今绿党政治的主流。^①由此可以理解,欧洲绿党在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所倡导的“绿色新政”,其基本意涵正是通过绿色公共投资创造绿色就业和实现持续经济增长,并赢得了不断增加的民众支持。^②

社会民主党的中右翼一派从来就是市场自由主义的信奉者。它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政治重新定向是同时在两个维度上进行的,即对后现代意义上的环境主义价值的主动吸纳(后物质主义化)和对新自由主义的被动顺从(“第三条道路”化或新中间化)。结果是,社会民主党的选举政治与政策主张日益体现为对环境主义价值的趋近和市场化管理工具的引入,以及对传统政治支持者和选民(传统产业工人与底层民众)的不断疏离。^③因而,从当初的“有质量的经济增长”到后来的“生态现代化”,再到如今的“绿色增长”、“明智的环境政策”,社会民主党作为整体正日益接近于绿党政治的主流。

基于并不相同的原因,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政党内部也存在着一个不断成长的环境一翼或渐趋强化的环境关切。如果说前者更多是由于宗教信仰、古典文化价值和乡村风景遗产保持与保护意义上的传统,以及由此决定的对于任何意义上的剧烈与迅速变化的内在恐惧和慎重,那么,后者更多是由于对日趋激烈的经济竞争压力和个体现代生活质量的考量,认识到环境友好的绿色经济或政策正在成为一个经济体或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就此而言,传统意义上的黑色/灰色政党已不复存在。

这种政党政治“绿色合流”的(当然是浅绿色意义上的或“生态资本主义”的)代表性例证是联邦德国。广义的绿色政策的最坚定支持者是1980年成立的

① 郁庆治:《欧洲执政绿党:政策与政治影响》,载《欧洲研究》2004年第4期,第105—117页;《绿党的欧洲化与欧洲民主》,载《欧洲研究》2006年第6期,第80—103页。

② 郁庆治:《作为欧洲党的欧洲绿党:以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为例》,载《欧洲研究》2009年第6期,第59—70页。

③ 郁庆治:《当代欧洲政党政治:选举向度下的西欧社会民主党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的绿党,包括生态保持、经济的绿色与生态转型、有机农业发展、环境经济政策工具引入、废除核能和发展新能源等,基本上都首先是由绿党提出和引入议会政治舞台,但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SPD)自1986年党章修改前后也开始强调“有质量的增长”,直至1998年两党联合执政后,将“生态现代化”写入联盟执政协议并成为随后近8年联合政府的指导路线。同样重要的是,现任总理默克尔作为科尔政府时期的环境部长(曾代表德国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在2005年执政后基本坚持了一种亲绿色政策的政治立场。此外,已经社会民主党化的民主社会主义党(PDS)也主张环境保护与社会公正政策的并重。因此,绿色政策取向在德国已经成为一种跨党派政治共识(它们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建议采取的步骤和时间表,比如废除核能)。当前,无论是社民党的主席(前环境部长)西格马·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还是基民盟的环境部长诺尔伯特·罗特根(Norbert Röttgen),都把绿色发展置于其政治理念的核心地位,因为“未来的市场/经济是绿色的”。

概言之,“生态资本主义”的初始性内涵是把市场原则扩展应用于各种形式的物质价值尤其是自然资源。然后,对于工商业者来说不仅可以发现大量的生态明智的替代性选择——从公共交通系统到人们的饮食起居,而且理应逐渐采纳与践行这些替代性选择。因为,与这些替代性选择相伴随的将是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并将导致一种大大减少物质与能源消耗的新经济,而那些最先意识到并引领这一趋势的工商业将会占得未来经济竞争的制高点。进一步说,它希望、相信和设想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克服或至少实质性缓和人类目前面临着的生态环境挑战。

依此而言,一方面,“生态资本主义”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或“浅绿的”绿色政治理论。无论就与“深绿”和“红绿”政治所主张的激进经济、社会与文化结构变革的比较来说,还是就它自身设定的革新而不是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政治志向来说,“生态资本主义”都是一种资本主义接纳生态向度而不是生态主义掌控资本的理论与实践努力。另一方面,“生态资本主义”也是一种较为实用主义的或注重实效的绿色政治社会理论。它既没有停留于那种“要工业还是要环境”的反消费主义悲观渲染,也没有沉湎于提出根本性改变我们时代文化的乐观主义宏大声称,而是致力于当代社会经济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反生态弊端的切实改善。而同时在上述两种意义上,对于“生态资本主义”的适当政治

判断的前提都在于对它本身的更客观的细致分析。基于此,接下来笔者将重点评述“生态资本主义”政治社会理论的四个主要流派及其基本观点:生态现代化、绿色国家、环境公民权和环境全球管治,尤其是它们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最新进展,然后将在此基础上做一个简短的评论。

二、主要理论流派及其基本观点

1. 生态现代化理论

20 世纪 80 年代初起,联邦德国的马丁·耶内克(Martin Jänicke)和约瑟夫·休伯(Joseph Huber)、荷兰的格特·斯帕加伦(Gert Spaargaren)、马藤·哈杰尔(Maarten Hajer)和阿瑟·摩尔(Arthur P. J. Mol)、英国的阿尔伯特·威尔(Albert Weale)和约瑟夫·墨菲(Joseph Murphy)等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不相容性的理论假定进行反思,并先后提出了一种“生态现代化”的环境难题应对的替代性思路,将关注的重点从环境问题的政策法律监管和事后处理转向了如何实现环境问题的预防和通过市场手段克服环境问题。^① 这一思路一经提出,就迅速被相关国家政府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洲联盟等国际机构所接受,并得到了不太激进的环境非政府组织比如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和世界自然基金(WWF)等的支持。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创新之处是对人类当代社会面临的生态挑战做了另外一种阐释,强调市场经济竞争和有能力国家推动下的绿色革新可以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减少环境破坏,而不必对现行的经济社会制度结构和运作方式做大规模或深层次的重建,因而

^① See Martin Jänicke, 'Preventive environmental policy as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and structural policy', *Science Center of Berlin IIUG Discussion Papers*, 2 (1985); Albert Weale, *The New Politics of Pollu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Arthur Mol, *The Refinement of Production: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Chemical Industry* (Amsterdam: The Fre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Press, 1995); Marten Hajer,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Policy Proc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Gert Spaargaren, *Th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Wageningen: PhD dissertation of Wageningen University, 1997); Arthur Mol and David Sonnenfeld (eds.),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around the World: Perspectives and Critical Debates*, special issue of *Environmental Politics* 9/1 (2000); Joseph Murphy,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OCEES (Oxford) Research Papers*, No. 20 (2001).

“环境”与“发展”之间可以呈现为一种兼得或共赢的共生性关系,而非彼此排斥的零和关系。生态现代化战略包括三个核心性构成要素:一是目标设定上强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并重和共赢;二是动力机制上强调“技术预防”或技术引领主义;三是运行机制上强调市场的优先性。注重市场作用是生态现代化战略的重要方面,但是,它所强调的并不是纯粹的自由市场力量——消除国家或相关政府部门的影响,而是通过干预纠正市场的失败和创造一个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以良性互动的交易转换框架。^①

马丁·耶内克曾这样概括了联邦德国版本的“生态现代化”^②:一般来说,对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副效果,我们有修复补偿、末端治理、生态现代化和结构性改革4种可能的应对思路。前两者是回应性的,它们的最大问题是成本太高,无论是生态环境破坏后的修复还是环境污染产生后的处置,都需要耗费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经济成本,这已经为20世纪50、60年代的环境污染及其治理实践所证实,最后者虽然是预防性的,但它的最大问题是现实可能性太小,公众对于结构性改变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比如对物质生活水平的消极影响有着强烈的抵触,很难给予足够的政治支持。相比之下,“生态现代化”理念有着自己的优越性:我们可以通过一种政策推动的技术革新和现有的成熟的市场机制,实现减少原材料投入和能源消耗从而达到改善环境的目的,也就是说,一种前瞻性的环境友好政策可以通过市场机制与技术创新促进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升级,并取得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的双赢结果。

概括地说,“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在过去10年中主要取得了如下3个方面的进展。

一是生态现代化与欧盟区域环境管治。“生态现代化”本来就是围绕着核心欧盟国家发展起来和不断拓展的一个欧洲性概念,而它旨在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技术革新取向促成了政府、科技界和工商业之间的广泛性政治同盟

① 郇庆治:《生态现代化理论与绿色变革》,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2期,第90—98页。

② 郇庆治、马丁·耶内克:《生态现代化理论:回顾与展望》,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2期,第175—179页。

与相互促动,尽管在具体管治或落实方面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① 苏珊·贝克(Susan Baker)甚至从身份认同的视角阐述了“生态现代化”对于欧盟发展的重要性。^② 在她看来,欧盟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公开信奉——作为其实施战略的生态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种“仅仅象征性的政治”,如果从代表权的意涵来理解“象征主义”,那么,可持续发展话语可以视为对欧盟的一种特殊代表方式并有助于欧盟身份的构建,因而,欧盟对“可持续发展”的象征性信奉并非简单是一种生态欺骗,而是承载着重要的转型潜能。

这方面的最新进展是面对2007年以来渐趋恶化的经济与金融危机而提出的数个“欧洲绿色新政”报告:世界观察研究所受联邦德国波尔基金会委托于2009年完成的《跨大西洋绿色新政》报告、新经济学基金会(NEF)受英国政府委托于2008年发起撰写的《绿色新政:综合的政策》报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技术、工业与经济部”于2008年发表的《全球绿色新政》报告,等等。^③

在上述所有报告中,由欧洲议会绿党/欧洲自由联盟党团(The Greens/EFA)授权、由著名的环境政策智库乌珀塔尔(Wuppertal)气候、环境与能源研究所研究完成的《欧洲绿色新政:危机背景下的绿色现代化之路》可以说是最绿、也是生态现代化色彩最为显著的一个。^④ 它指出:“时下的欧洲正面临着多重危机:财政的、经济的、环境的和社会的。因而,它对可持续政策的需求是不

① Alan Neale, 'Organising environmental self-regulation: Liberal governmentality and the pursuit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in Europe', *Environmental Politics* 6/4 (1997), pp. 1—24; Stephen Young (ed.), *The Emergence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Integra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2000); Debra Johnson,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Europeanization', in John Barry, Brian Baxter and Richard Dunphy (eds.), *Europe, Globa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2004), pp. 155—159.

② Susan Bake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symbolic commitment: Declaratory politics and the seductive appeal of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in European Union', *Environmental Politics* 16/2 (2007), pp. 297—317.

③ World Watch Institute, *Toward a Transatlantic Green New Deal: Tackling the Climate and Economic Crises* (Brussels: Heinrich-Boell-Stiftung, 2009);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A Green New Deal: Joined Up Policies* (London: NEF, 2008); UNEP, *Global Green New Deal* (London/Nairobi, 22 October 2008). 对这些报告的批评性评论可参见 Ariel Salleh, 'Green new deal or globalisation lite?' *Arena Magazine* 105 (2010), pp. 15—19.

④ Philipp Schepelmann et al., *A Green New Deal for Europe: Towards Green Modernisation in the Face of Crisis* (Brussels: Green European Foundation, 2009).